

勃艮第宫廷的服装政治学

——以彩绘手稿《让·沃奎林向菲利普三世献书》为例

张莹

北京城市学院,北京 100083

摘要:以《让·沃奎林向菲利普三世献书》为例,分析15世纪勃艮第公爵菲利普三世统治时期,绘画中的服装对图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由此形成的勃艮第宫廷独特的服饰文化特征和宫廷文化特点。《让·沃奎林向菲利普三世献书》不但较为全面地反映出15世纪上半叶勃艮第宫廷的服饰时尚,而且兼具复杂的叙事性。采用历史学和比较学的研究方法,将图像中的服装与社会生活、染织技术、宫廷文化等关联起来,剖析服装与历史生活密切相连的复杂结构。以菲利普三世为代表的勃艮第贵族强烈的个人服饰特征,结合骑士精神和壮丽恢宏的宫廷氛围,形成了勃艮第宫廷独特的宫廷文化,塑造了欧洲顶级宫廷的贵族形象。

关键词:罗吉尔·范德·韦登;彩绘手稿;15世纪;勃艮第宫廷

中图分类号:J18;J5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6946(2020)06-0040-05

DOI: 10.19798/j.cnki.2096-6946.2020.06.005

Clothing Politic of Burgundian Court: Taking *Jean Wauquelin Presenting His 'Chroniques de Hainaut' to Philip the Good* as an Example

ZHANG Ying

Beijing City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analyze how clothing affects characters in painting and the unique clothing style as well as culture characteristics at the court of Philip the Good, Duke of Burgundy in the 15th century, through careful study of the painting *Jean Wauquelin Presenting His 'Chroniques de Hainaut' to Philip the Good*. The painting itself not only reflects the fashion phenomena of Burgundian court in the first half of 15th century, but also belongs to the complex narrative work. With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approaches, we analyze the complex structure of clothing and historical life by discovering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clothing in painting and social life perspectives, dyeing and weaving technology, royal court culture, etc. The striking characteristics of personal clothing of the Burgundian peerages, represented by Philip the Good, together with chivalric code and splendid court of Burgundy, formed the unique Burgundian court culture and shaped the noble image in the grand European royal court.

Key words: Rogier van der Weyden; illuminated manuscripts; 15th century; court of Burgundy

15世纪,瓦卢瓦王朝的勃艮第公爵菲利普三世(Philip the Good, Philippe le Bon,也译为“好人菲利普”,1396—1467年)通过一系列外交和军事手段不断

地扩大公爵所属领地,成为当时欧洲最具有权势的领主之一。尤其是15世纪30年代之后,勃艮第宫廷在欧洲的威望甚至已经超越了法国和英格兰宫廷。当然,

收稿日期:2020-09-20

基金项目: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18ZD20)

作者简介:张莹(1985—),女,河南人,博士,北京城市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欧洲中世纪服饰文化。

除了菲利普三世和查理七世于1435年在阿拉斯经过谈判获得临时豁免之外，勃艮第公爵在政治上依然长期隶属于法国。虽然公爵在欧洲一直缺乏正式的王室身份，但是菲利普三世通过对公爵家族历史与亲缘关系的梳理和对所征服地区历史的整理等一系列方式，阐释了勃艮第公爵的历史传承性。同时，还通过对宏伟壮丽的勃艮第宫廷的建造、富丽奢华的宫廷服饰与礼仪的展示营造了华丽高贵的宫廷氛围，在欧洲各个王室宫廷之中凸显了自身的王者风范和强大势力。菲利普三世统治的后期，公爵委托编年史家翻译、整理和撰写了众多地域史书，《埃诺编年史》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部。

1433年，菲利普三世征服了埃诺、泽西等地区，几年之后，在公爵的议员兼埃诺省省长西蒙·诺克特(Simon Nockart)的倡议之下，公爵委托编年史家让·沃奎林(Jean Wauquelin)将该省最重要的历史著作《埃诺编年史》(Chroniques de Hainaut)译著为法语。该编年史约在1446年至1450年间撰写，共分为三卷，只有第一卷已经完成，其余两卷仍处于草稿状态。《埃诺编年史》卷首页(1448年)收藏于比利时皇家图书馆，见图1。在第一卷的序言之中，勃艮第公爵菲利普三世作为一长列统治者的合法继承人，其起源可以追溯至特洛伊的沦陷。

一、《埃诺编年史》卷首图《让·沃奎林向菲利普三世献书》

《埃诺编年史》的卷首图《让·沃奎林向菲利普三世

献书》(见图2)是佛兰德斯最著名的彩绘手稿(中世纪或文艺复兴早期手抄本中的微型画)之一，图像保存相对较好，描绘了让·沃奎林向菲利普三世献书的场景。这幅彩绘手稿集复杂的叙事性与传情达意的艺术性于一体，也是佛兰德斯画家罗吉尔·范德·韦登(Rogier van der Weyden)唯一已知的彩绘手稿。1847年，德国艺术史家古斯塔夫·弗里德里希·瓦根(Gustav Friedrich Waagen)最早提出这幅卷首图出自范德·韦登之手^[1]，这一说法也得到了许多艺术史家的支持^[2]。尽管艺术史家对绘制者是范德·韦登本人还是其工作室成员这一点依然存在争议，但是图像在对人物着装的精妙绘制，如对锦缎服饰的特殊处理，以及对图中阴影的透明度与光线微妙质感的把握上都体现了范德·韦登精湛的艺术功力。因此，笔者认为范德·韦登至少负责了大量的原始设计和绘制。

作为勃艮第宫廷这一时期最壮观、最具影响力的彩绘手稿，《让·沃奎林向菲利普三世献书》戏剧性地展示了富丽奢华的宫廷仪式。图像由三个部分构成，中间部分是菲利普三世父子和献书者，左侧是三位朝臣，右侧是八位传统贵族。公爵菲利普三世和其子查理·德·夏洛莱(Charles de Charolais，未来的公爵“大胆的查理”)都穿着普利兹褶的短款“吾普朗多”(Hoppelonde，也译为“胡普兰衫”)。它是哥特式后期欧洲贵族重要的服装样式，在约1359年作为当时变短男装的一种弥补而出现的室内衣，不久也被女子采用，并逐渐发展为贵族男女室外穿着的盛装。让·沃奎林身穿色彩暗淡



图1 《埃诺编年史》卷首页



图2 《让·沃奎林向菲利普三世献书》

的灰蓝色“吾普朗多”，跪在公爵面前献出皮革和金属装帧的《埃诺编年史》。图像左侧的三位人员从左至右依次是埃诺省省长西蒙·诺克特，身穿红色“希莫尔”（Chimere，穿着在法衣之外的无袖外衣）的图尔奈主教杰汉·雪佛罗（Jean Chevrot）和穿着亮蓝色长款“吾普朗多”的公爵大臣尼古拉斯·罗林（Nicolas Rolin）。西蒙·诺克特是菲利普三世的议员，公爵正是通过他委托让·沃克林撰写的《埃诺编年史》法译本。图尔奈主教杰汉·雪佛罗同时也担任公爵大议会主席，大议会是既是公爵的私人咨询机构，也是勃艮第宫廷的法院。紧随菲利普三世右手边的是他的“得力助手”公爵大臣尼古拉斯·罗林。1385年，勃艮第的第一位公爵菲利普一世（Philip the Bold，也译为“大胆的菲利普”）创立了总理府，他任命在巴黎议会享有盛誉的律师杰汉·卡纳德（Jehan Canard）担任总理府的公爵大臣一职。从此，公爵大臣取代了勃艮第和弗兰德斯公爵控制之下各个地区的总理，成为了行政官员的总负责人。公爵大臣尼古拉斯·罗林与图尔奈主教雪佛罗都是出生于资产阶级家庭，之后经过学习罗马法律和行政管理技能从而效忠公爵的典型代表。

图像右边的八位朝臣则是传统的世袭贵族，他们的服装挺括有型、色彩饱和度和亮度比较高，并且都佩戴着黄金和珠宝制成的金羊毛勋章颈饰，这是金羊毛骑士团（Orders of The Golden Fleece）成员所独有的配饰。与菲利普三世一样穿着黑色“吾普朗多”的是勃艮第公爵的第一任管家，卢森堡的总督安托万·德·克罗伊（Antoine de Croy）。克罗伊作为金羊毛骑士团的最初成员之一，自然也佩戴着金羊毛勋章的颈饰。图像中公爵父亲和传统世袭贵族不仅佩戴的金羊毛勋章十分耀眼，衣着也更为时尚，短款普利兹褶的“吾普朗多”常使用含有金线或银线刺绣的天鹅绒面料。

二、骑士精神复兴和金羊毛骑士团

中世纪晚期是欧洲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变革的重要时期。政治方面欧洲各王国都朝着王权集权化方向发展；经济方面，庄园式经济形式缩减、商业发展迅速、城市不断兴起；社会结构方面，在国王、贵族、农民（奴）之外，出现了新的市民阶层。市民阶层不但包括提供充裕税收的商人，还包括为王权提供高素质服务的行政官员及精通罗马法的法律从业人员，他们成为了王室重要的人才储备。城市市民阶层的崛起与王权的加强密不可分，相互促进。许多无贵族家世和地产的市民阶层被国王册封为新的贵族，形成了直接效忠王室的“穿袍贵族”集团。

传统的贵族家族受到像公爵大臣罗林和图尔奈主教雪佛罗这样新贵家族的威胁。在这种背景之下，骑士精神和贵族的准则重新受到了传统贵族家族的重视，他们强调对王室的服侍和忠诚，以及在军事方面的英勇善战等品质。例如，德·克罗伊家族为其父亲杰汉·德·克罗伊在阿金库尔战役中牺牲而深感自豪。传统贵族认为那些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通过为王室或公爵提供法律或行政服务而获得贵族头衔的人，并不是合格的贵族，美德、荣誉及高贵的出身才是贵族的主要特征。传统贵族家族排斥将经济上的富有作为贵族的衡量标准，甚至把提供服务而获得金钱理解为一种侮辱。勃艮第宫廷的编年史家乔治·查斯特兰（Georges Chastellain）曾在书中写道：“你付钱给我，这使我感到羞耻，我不习惯收受这些钱财，因为我不想把我的服务以金钱的方式卖给一个好人^[9]。”然而，从当时的禁奢法令中可以看出，富有的市民阶层和贵族之间已经建立了一种可以转换的关系。例如，每年收入五百至一千英镑的非贵族允许穿着与低等骑士相同的服装^[4]。这就在服装上将收入和阶级之间建立了一种联系，这种联系也是商业发展的必然结果。随着新的社会阶层的崛起，传统骑士价值观不断被重新强调，阶级壁垒在动摇中反复强化，骑士精神在许多方面也达到了顶峰。

1430年，勃艮第公爵菲利普三世在与葡萄牙公主伊莎贝拉结婚之际，建立了在欧洲极具影响力的金羊毛骑士团。金羊毛骑士团最初与古代异教神话密切相关，15世纪30年代回归基督教，至15世纪60年代，图尔奈的另一位主教纪尧姆整理的思想体系中体现了亚里士多德的基本道德观念^[9]。以金羊毛骑士团为代表的勃艮第的骑士制度有着持久有效的能量，15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之间，法国圣迈克尔骑士团（The Order of St. Michael）及丹麦、德国、意大利的骑士团体都相继建立，历史学家玛丽娜·贝罗泽斯卡亚和保尔墩（Boulton）都认为这些骑士团或是效法，或是跟随勃艮第公爵菲利普三世建立的金羊毛骑士团^[9]。15世纪40年代中期，勃艮第的金羊毛骑士会员资格成为一种有效的外交手段，阿拉贡国王阿方索五世（Alfonso V）、奥尔良和不列颠尼的王子等人被授予了金羊毛骑士团会员资格，在这个政治和经济等多方面不断变化的时代中见证了勃艮第风格的骑士宫廷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与号召力。彩绘手稿《向菲利普三世献书》对比见表1。图2和表1前五幅图中的公爵菲利普三世都佩戴着金色的金羊毛勋章颈饰，与公爵穿着的黑色“吾普朗多”、黑色帽兜“巴贝特-夏普仑”（Burllet-chaperon，

表1 彩绘手稿《向菲利普三世献书》对比

图片	创作时间	图片名称	图片	创作时间	图片名称
	1442年	马丁·勒·弗兰克 (Martin le Franc) 向菲利普三世献书		1450年至1960年	吉耶贝尔·德·朗努瓦 (Guillebert de Lannoy) 向菲利普三世献书
	1446年	让·沃奎林向菲利普三世献书		1457年	让·梅洛 (Jean Miélot) 向菲利普三世献书
	1447年	吉拉特·德·鲁西永 (The Master of Girart de Roussillon) 向菲利普三世献书		1460年	路易·德·古鲁塞斯 (Louis de Gruuthuse) 向菲利普三世献书

14至15世纪男女皆宜的有垂尾的帽饰,有时将垂尾环绕下巴)、以及黑色的尖头鞋“波兰那”(Poulaine, 14至15世纪流行于欧洲的尖头鞋)相互映衬,凸显金色勋章的璀璨。

三、图像中服装对人物形象的塑造

图像《让·沃奎林向菲利普三世献书》不仅描绘了勃艮第传统贵族统一佩戴金羊毛勋章所表现出的骑士精神,而且还展示了当时在欧洲处于领先地位的宫廷服饰时尚。15世纪40年代以来,勃艮第贵族服装的样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其特点主要是外衣“吾普朗多”的肩部和头饰“巴贝特-夏普仑”都使用填充物使其挺括有型,外衣使用量比较大的普利兹褶,穿着双层内衣等。例如,公爵菲利普三世穿着黑色普利兹褶的“吾普朗多”,戴着黑色的头饰“巴贝特-夏普仑”和黄金镶嵌珠宝的金羊毛勋章颈饰站在王座之前,在袖口和衣摆处露出棕色毛皮,衣前开口处露出镶嵌宝石的白色内衣。公爵左手拿着权杖,右手拿着一把小锤子,两者皆是公爵权力的象征。传统贵族的服装和公爵的服装在

样式上有很大的相似性,并且都配以金羊毛勋章颈饰,不同的是传统贵族没有佩戴头饰。金羊毛勋章颈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构建骑士团团员的个人身份并展示其美好品德,因为坚毅、贤良、谨慎和勇感这些美好品德是金羊毛骑士团成员必须具备四项基本道德^[5]。与传统贵族的服装相比,公爵右边朝臣的着装更符合人物职业的特点,他们都穿着象征博学的长袍。图尔奈主教杰汉·雪佛罗穿着红色基督教服装“希莫尔”,肩部披着“夏普仑”。公爵大臣尼古拉斯·罗林穿着长款的“吾普朗多”,戴着“巴贝特-夏普仑”头饰,腰带上挂着金色刺绣的绿色天鹅绒钱包。钱包既是公爵大臣财政权力的象征,又是怜悯等美德的体现;腰带的象征性则更为复杂,既是勇敢的象征,又可以作为对身体的一种隐喻,提醒佩戴者控制自己的欲望等^[6-7]。

查理·德·夏洛莱站在菲利普三世的右边,作为公爵的合法继承人,其服装材质与公爵身后的挂毯一致,都是使用黄金丝线制成的纺织品。它通过金线的疏密不同来产生微妙的光亮和色差,结合丝绸的光泽,产生奇妙且立体的铸造般的视觉效果。这种璀璨的蜿蜒石

榴图案的金织锦通常只用于公爵家庭成员的服饰之中。《大胆的查理与圣乔治》出自《大胆的查理祈祷书》(1457年),见图3。图中成年的查理·德·夏洛莱也穿着这种黄金和丝绸制成的长款“吾普朗多”。笔者在《中世纪晚期欧洲人色彩认知初探》中也提到,高亮度、高饱和度色彩的服装一直深受中世纪贵族的喜爱,这源于人们对色彩和光关联性的认知。色彩的亮度与饱和度被认为与光的神圣性相连接,当色彩的色泽褪却时,人们认为它的神圣性也会随之消失,因此,对高饱和度、高亮度、强固色能力的色彩的追求不断地促进染色技术的提升和纺织技能的提高。金银丝线、富有光泽感的丝绸,以及光亮柔软的高档羊毛制品都是富有权势的王室和贵族打造自身华丽恢弘着装形象的主要材料。其中,黄金丝线制成的服饰更是地位和权势最为瞩目的象征。

相较于查理·德·夏洛莱对金织锦的喜爱,菲利普三世则更加偏爱黑色服饰(图2和表1的图像中,公爵都穿着黑色的服装),传统史学研究者常将其归因于公爵为了哀悼其死于非命的父亲。事实上不止如此,菲利普三世在其统治期间,将黑色逐渐过渡成富有勃艮第宫廷独特尊贵感的色彩,并形成其特有的个人风格,以至于在之后的两百多年里,黑色成为了勃艮第血统和独特品味的象征。在菲利普三世的父亲去世之后,他像每一位基督徒王子一样穿着黑色的服装哀悼,但在15世纪30年代下半叶之前,公爵依然会穿着其他颜色的服装^[9],直到15世纪30年代末,他的服装除少量代表金羊毛骑士精神的红色服装之外,几乎全部改成了黑色。作为哀悼而使用的黑色与时尚流行的黑色大不相同,在染色技术尚不够成熟的14世纪早期,黑色作为表达哀悼的颜色简朴灰暗,但时尚流行的黑色是使用五倍子(树木分泌一种汁液包裹树上的虫卵,并逐渐形成一个球形硬壳)染色,色泽纯正、均匀,并且色牢度高。五倍子染色的丝绸和精纺羊毛织物价格十分昂贵,更不用说深受菲利普三世喜爱的黑色裘皮,这些黑色衣料显然并不能符合黑色所蕴含的节制和谦卑的宗教精神。可见,公爵长期执着地选择黑色服装既不完全是哀悼的因素,也不能很好地符合黑色所代表的宗教精神。尽管公爵对黑色的喜爱可能受时尚流行的影响或有着情感上的诸多原因,但是从大量菲利普三世穿着黑色服装的图像可以推测,黑色对菲利普三世而言,具有强烈的政治意义。尤其是范德·韦登为其绘制的大量肖像画中,纯正、浓密和光泽感的黑色成为他强烈的个人符号,甚至可以称之为一种刻意的肖像策略。这不仅适用于他的黑色服装,而且适用于金羊毛

勋章颈饰,从文字资料中可以看到公爵曾多次花费大量钱财来修理颈饰^[9],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公爵佩戴的频率之高。

自13世纪中叶以来,西欧各国王室权力不断增加,宫廷不仅是各国政治权力的中心,而且还成为了文化和艺术的中心。正如勃艮第编年史家乔治·查斯特兰(Georges Chastellain)描述的那样,“贵族的权力直接反映在其宫廷之中”^[10]。15世纪40年代开始,菲利普三世开始大量赞助有丰富彩绘手稿的手抄本历史著作,而其中的插图,尤其是在手抄本的卷首图中既可以直观地看到宫廷贵族的着装,其内容本身又是手抄本书籍文化背景下的一部分。以范德·韦登为代表的注重现实主义描绘的艺术家,他们绘画技艺精湛,在空间和透视上注重细节表现,艺术性和表现力远超14世纪的彩绘手稿,因此,在欧洲广为流行。彩绘手稿在制造、传播宫廷服饰时尚,以及塑造个人形象中扮演着重



图3 《大胆的查理与圣乔治》

(下转第56页)